

清代陕西勉县武侯祠研究

冯岁平 余星银

陕西勉县武侯祠是全国第一座武侯祠，也是刘后主刘禅诏定唯一的武侯祠。这在全国武侯祠之中，早已是不争而明的事实。不过这些武侯祠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在这里以不同的纪念方式传承着这位千古贤相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古今皆然之精神，以此焕发出创造新历史的精神原动力。正因为如此，各地武侯祠的社会教育意义不言自喻，其功能亦日见增强。因此，分析历史时期武侯祠的纪念活动，应该说是研究武侯祠的历史沿革与诸葛亮文化现象的重要内容，尽管各地武侯祠纪念的形式多样，内容也不尽相同。本文根据现存陕西勉县武侯祠、墓碑石等实物资料，以及虚白道人（李复心）《忠武侯祠墓志》等文献资料，以勉县武侯祠、墓为中心，以清代为时代界限，分析其重要的纪念形式——祭祀以及清明庙会的历史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勉县武侯墓前有山门、献殿等，兼备武侯祠的功能，又可视作一座已变相的武侯祠，再说早期的勉县武侯祠，其祠址紧临武侯墓，祠、墓近在咫尺，故武侯墓亦纳入本文论述范围之内。

一、清代之前的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祀

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亦是影响后世的千古名相。对于这样一位知名人物，上至朝廷下至民间，无不对他充满崇敬之情。诸葛亮病卒五丈原军中，归葬定军山之后，百姓怀念，“所在各求为立庙，朝议以礼秩不听，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”，^①由此衍成“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”。景耀六年

（263年），蜀汉朝廷终于就近其墓，“立庙于沔阳”，而且“凡亲属、臣吏、百姓等赐祭”，“皆限至庙，断其私祭，以崇正礼。”^②这是武侯祠立庙祭祀之始，陕西勉县武侯祠随之成为全国最早致祭诸葛亮的祠堂。

景耀六年秋，镇西将军钟会率魏军进占汉中，在定军山下，“祭亮之庙，令军士不得于亮所左右刍牧樵采。”其为对手所尊崇，这在历史上实在不多见，由此看出诸葛亮在当时的深刻影响。西晋时，著名史学家呈《诸葛氏集》时，也有“黎庶追思，以为口实。至今梁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。言犹在耳。虽《甘棠》之咏召公，郑人之歌子产，无以譬也。”当时梁益之民仍深深追念着诸葛亮的功绩，亦可看出祭祀之风在其病卒后的很长时期内仍持续不断。

勉县武侯祠举行祭祀之仪，此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唐贞元三年（787年），武侯祠“风雨飘摇，祠堂落构”，且“登降不能成礼，牲玉不得备陈”。其破败不堪直接影响到武侯祠的祭祀，“荒祠偏倚，庙貌诡制，非所以式先贤，崇祀典也”。^③因此对武侯祠作了重新整治，其面貌焕然一新，推测其举行祭祀之礼亦有所保障。晚唐著名文学家孙樵，曾这样记载：“武侯死殆五百载，迄今梁、汉之民，歌道遗烈，庙而祭者如在，其爱于民如此而久哉。”^④梁、汉之民，对诸葛亮之纪念，其风依然浓厚，而且还波及到四川一带。宋代祭祀之风，虽然《忠武侯祠墓志》记载“宋元以前无考”，^⑤但从现存诗歌等作品看，当时祭祀仍

是勉县武侯祠、墓的重要纪念活动之一,陆游《游诸葛武侯读书台》中“定军山前寒食路,至今仍祠丞相墓”,就是这一习俗的见证。明成化二十一年(1485年),朝廷对“先贤往哲,无不敦崇,以励风俗”,而且“命下所司,每岁仲春致祭,以表忠节,诚盛世之优典也”。但勉县武侯祠却是“祀礼既举,宅神之所未备,何以陈牲牺,设礼容。”^⑥说明庙貌不整已严重影响到祭祀的举行。大凡如此,这种现象在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。

总括而言,自诸葛亮遗葬定军山后,民间祭祀一直持续不断,景耀六年立庙沔阳,使这种祭祀活动名正言顺。后世祭祀之风仍然十分盛行,且期间似未曾中断,尽管有时受祠、墓建筑破烂的影响,但这种通过祭祀来纪念诸葛亮的风气不仅盛行,而且成为一种习俗,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。

二、清代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祀

如果说自三国至明代官民合祭没有明显差别的话,那么至晚在明正德九年(1514年),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祀官民致祭已有显著区别。原来是蓝璋疏请朝廷举行祭祀之礼,获朝廷批准后,遂有春秋二祭之制,此即官祭。而民间之祭似以清明节庙会为主。这是武侯祠、墓祭祀的重要转变。进入清代之后,这种祭祀无以复加地得到重视。不过其礼仪已有官方与民间之别,包括祭祀的祭礼、祭期、祭品,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。不过即就是官方所祭,在大殿与后殿等不同场所,亦有所不同,如后殿的祭品即不设太牢。

有清一代,汉南人士对诸葛武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,甚至将之几近神化。“沔民之于武侯也,饮食必祭,水旱、疾疫必祭”,而且称其坟为“爷坟”,其庙为“爷庙”^⑦;“汉南人士,于侯水旱、兵疫必祷,岁时伏腊必祭,而侯之英灵呵护庇佐,奇迹屡昭。”^⑧民间之所以普遍信奉诸葛神灵,缘于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军进占汉中,却对诸葛祠、墓及其周围丝毫未

扰,因而传言孔明神灵保佑,嘉庆皇帝不仅赐“忠贯云霄”匾额,还颁藏香遣官致祭,“祀以太牢,煌煌巨典,于斯为盛”^⑨。由此影响其后很长时期。值得注意的是,作为祠、墓的最高负责者,历代住持对其尽心尽力,勉力维持着祭祀之礼的举行。譬如,祭祀中祭品的放置地方,在嘉庆初年前,是没有专门场所的,至七年时,住持专修武侯墓的别院,预置祭品。^⑩尽管如此,其祭祀发生了不正常的现象。如清末民初,“今已庙宇倾圯,墓产沦没,文献失徵,无从规复,且墓产之款,经理不力,虽有春秋二祭,皆属敷衍相将。一切废弛,曷胜浩叹!”^⑪但总的来看,清代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祀之规模,是前所未有的,其鼎盛时期应在嘉庆、道光时期。

下面就清代祭祀之祭礼、祭期、祭品、祭文和致祭费用等,作简要概介。

祭礼(祭仪) 明代武侯祠、墓的祭祀,到清代雍正二年(1724年)后,从祀孔庙,诸葛亮位居二十六人之一。嘉庆八年(1803年)秋八月,皇帝御制祭文,钦差工部右侍郎彭龄以太牢致祭,颁发藏香三枝。嘉庆十六年(1811年),周明球以御祭之制,咨部议,筹款致祭。第二年,开始举行春秋二祭,由此遂成定制。祭礼之中,最隆重的是遣官致祭仪礼。据文献记载,这种祭祀祭仪庄严而隆重,肃穆而规正;而且边行礼边奏乐,一起一伏,一作一止,颇具节奏感,其程式化的礼仪,虽略显繁琐,却表达当时朝野对诸葛亮虔诚的尊崇、膜拜之情。

这种祭礼,可分准备期与祭祀期,自然最为重要的是祭祀时前后有序的各种祭礼。兹按曾任宁强知州、汉阴知厅的钱鹤年《礼仪图》例举如下:

(1)祭祀先一日,准备期。

住持打扫清洁内外殿宇,礼房吏具祝版、祭品于神位前,行陈设礼;承祭官委员、监视委员、宰牲委员著补服至庙,封帛毕。

(乐作)

礼生引祭所,省牲礼生接毛血供香案,省牲官行一跪三叩,首礼毕。

(乐止)

(2)祭祀之日,正式祭祀期。

祭日昧爽,各官俱至庙,穿朝服,设坐官厅。承祭官签祝文,毕。起鼓,赞引官引承祭官,至盥洗所。

(乐作)

盥洗毕,至行礼处,立。典仪唱“执事者各司其事”。赞引官赞就位,承祭官就位立。典仪唱“迎神”,司香官捧香盒,跪香案左,赞引官引承祭官,至案前,立。赞上香。

(乐止)

承祭官上藏香,又上三瓣香。毕,赞引官赞复位,承祭官复位,立,赞引官赞叩兴。

(乐作)

承祭官、陪祭官行三跪九叩首,礼毕。

(乐止)

典仪唱,献帛,行初献礼,捧帛官跪,献毕。

(乐作)

三叩,首退。执爵官立,献爵于案,退。读祝官至祝案前,一跪三叩首,捧起祝文,立。赞引官赞跪,承祭官陪祭官、读祝官,俱跪,赞读祝。

(乐止)

读祝官读毕,捧祝文置案上帛匣内。

(乐作)

三叩首,退。赞引官赞叩首,兴。承祭官行三叩首,礼兴。

(乐止)

典仪唱“行亚献礼”。

(乐作)

执爵官献仪如初,献礼献于案左,典仪唱行终献礼。执爵官献爵如亚献礼献于案右,退。

(乐止)

典仪唱“彻饌送神”。

(乐作)

赞引官赞,跪叩首,兴,承祭官、陪祭官行三跪九叩首礼,兴。

(乐止)

典仪唱“捧帛祝恭诣燎位”,捧帛祝官至案前,跪捧帛祝送至燎所,承祭官转立两旁,俟帛祝过,仍复拜位,立。赞引官赞诣望燎位。

(乐作)

承祭官立,燎所帛祝焚半,赞引官赞,礼毕。

(乐阕)

各退。

上述所言,典仪、赞引、读祝官,以本地礼生充任,执事官,以州县佐官充之,地方正印官以下,俱陪祭。据徐国平先生研究,浙江兰溪诸葛村大公堂的祭祀,其“祭冬”有多达18道程序,^⑩但具体细节不详。从现存资料看,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典,庄严而肃穆,隆重而有趣,值得今天作深入研究。

祭期 作为纪念诸葛亮的祠堂,勉县武侯祠自然有祭祀的时间界定,其祭期亦分官方与里中社会两类。官方的祭期,从明代正德九年开始,直到有清一代,实行春秋二祭,即2月12日为春祭,8月12日为秋祭,且“永著为令”。此后,基本承循未易。其祭期与浙江兰溪诸葛村稍有差异。^⑪

里中社会的祭期则明显不同,武侯祠为“每年八月二十三日起,是日为忌辰,二十四日演剧至二十七八日止,赛神享胙,极其诚敬。”^⑫勉县武侯墓的祭期有别于勉县武侯祠。其“祭期,每年清明节前后,演剧三四日,亦里中社会也。”

祭品 行祭礼,则需要祭品。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品,早期尚为简单,明代正德九年,蓝璋奏请春秋二祭时,祭品仅有羊一、豕一。这种祭品之制,直至嘉庆初年,仍传承未改。

嘉庆十七年(1812年),春秋二祭始定规制,祭仪与祭典业已定型,祭品亦有规定。虚白道人《忠武侯祠墓志》记载,大殿的祭品有:

牛一;

羊一;

豕一;

登一,太羹;

左簋一,和羹;

右簋一,和羹;

左簠二,黍稷;

右簠二,稻粱;

左筵十,盐、鱼、枣、栗、榛、菱芡、芡、鹿脯、白饼、黑饼;

右豆十,韭菹、醯醢、芹菹、兔菹、鱼、醢脾、析、笋菹、豚;

酒爵三;

烛二;

灯十盏。

这些祭品陈设,亦列次序。最前排,中为香案,上置香鼎和烛灯二,右为洗盥,右为篚;第二排,中为香案,置牛、羊、豕各一,右为酒尊,左为祝版(书写祝文之版,又名祝板);第三排,中为俎、簋、簠各一,右为十篷,三排,前二排各为三,后排为四,左为十豆,亦为三排,排法如右次序;第四排,中为登,左右为簋各一;第五排为三爵,最后一排灯式。这种严格的陈设次序,自然是当时最为讲究的仪制之一。

有祭品便有祭器,所谓祭器就是祭祀时的礼器。据《祠墓志》,“祠中旧无祭器,嘉庆皇帝赐祭后,祭器俱系借用”,^⑤后来渐有祭器,至终如上所述。这些祭器日常放置于武侯墓的别院之中。

个人致祭的祭品,明显不如上述所说的正式场所的祭品。如光绪十三年(1887年)五月,黎庶昌致祭武侯墓,所用祭品为“只鸡,斗酒,黍饭,豚,羹”,^⑥可以说他所用的祭品较少,当然其祭祀主要反映的是一种纪念的

意义。其实历史上民间的祭品,与上述两种情况也不同,从而显得五花八门。如民众“有献全猪者,有献三牲者,又有献灯油与白盘(即馒头)者”。祭祀所需的“香烛、黄表、花炮、冥钱,极丰厚。”祭毕之后,则“化钱焚帛,围墓而坐,以享胙。若男若女,如拜扫先人之墓者。其献三牲、白盘者,亦围墓而享胙。”^⑦看来,武侯祠、墓附近的群众很大程度将之视为一种信仰,从而演化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习俗。

其实民间这种做法,无非反映了对诸葛亮的尊崇和虔诚。这种尊崇和虔诚可谓是无所不至,几于顶礼膜拜。如上述所说白盘即馒头,而且称之为“一副馒头”,到底现在有没有此种叫法。所谓一副,指的是每十个馒头需用麦十斗。而磨面时,先洗净碾磨,再以人代推,最后取上等面做成馒头。^⑧整套程序,无不精心之至,如此方算虔诚、恭敬。

祭文 举行祭礼,亦需祭文。祭文是一种文体,指祭祀时诵读之文。一般来说,祭文分散文、韵文、骈文等类,其内容有祈祷雨晴、驱逐邪魅、干求福降和哀悼死亡四类,其中以哀悼死亡为主。武侯祠、墓祭文,归根到底是追念千古名相诸葛亮,以激励立志立功立名。

从现存资料看,勉县武侯祠、墓最早的祭文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。万历二十七年,李化龙“奉命入蜀”,道经武侯墓,遂“陈牲击鼓,为文以祭。”^⑨万历二十九年,李化龙又“以牲体之仪”^⑩,致祭于诸葛亮灵前。有清一代的祭文,应该说是层出不穷,尤其是重视祭祀的嘉庆时期等。不过保存至今的仅有嘉庆八年彭龄和光绪十三年黎庶昌的两篇祭文。除此而外,城固县文化馆馆藏《祭诸葛武侯文》一件(编号322),因未公开刊布,故不得其详。彭龄祭文,系其奉命致祭之文,欲“共仰神明之显佑,载瞻遗像之清高”,企望丞相天威作“岩疆保障”,^⑪明显带有靖乱治平的倾向。而黎庶昌的祭祀,则是“蓄私愿于卅载”^⑫对诸葛高崇敬之愿的子却,可视为一种个体行

为。无论如何,祭文是后世致祭者追念诸葛亮精神的载体之一,也是祭祀时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,因而其历史、文学价值均不可轻视。

与祭文相类的是祝文,正殿、后殿祭祀时均有祝文。虽然两者有着不同,但其意义却大致相同。如后殿祝文,现存嘉庆时期沔县县令周赓的祝文是:

维公世泽,貽庥灵源,积庆德能,昌后笃生,文武之英。善则归亲,宜享尊崇之报,列先儒之祀典,锡命优隆,合三代以明,礼乐兼备。恭逢仲春秋,祇事荐馨。尚飨!

当然,明清时期勉县武侯墓附近的群众对诸葛亮有份特殊的感情,对孔明的崇拜几近神化,尤其是章回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付梓流行后,这种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前述勉县民众称庙为“爷庙”,称墓为“爷坟”。而“除水旱灾疫必祷外,或妯娌口角,夫妇不睦,以至鸡鸭琐事,亦哭诉于侯之位前”,可以说这是对爷庙、爷坟的纪念,请求诸葛保佑的有力见证。类似于官方祭文,民间求拜时,亦有许愿、祝神等词,如有的说;“武侯爷爷在上,弟子在下,你老人家前知五百年,后知五百年,中知五百年,是如今活神。弟子某人某氏,为某事黑处投明”。大愿云:“叩许花戏一台,供猪一口”,小愿则说;“白盘一副,灯油几斤,如蒙感应,宝烛长钱送上殿来”。由此足见诸葛亮在民间的影响至远且深。

致祭费用 如当时隆重的春秋二祭,按清代嘉庆年间的实际,估计需银十六两七钱六分。这些费用则由司库筹款项内支付。尽管如此,有时春秋二祭费用还是捉襟见肘,但总的来说还基本上能正常得到保障。

而民间祭祀所需费用与官方显然不同,其筹措的方法颇是有趣。“其积会之法,以十人为一会,每人钱一百文,买一小猪,至次年清明节,约七八十斤。又每人凑麦一升,以造白盘;钱一百左右不等,以备香烛、冥钱、花

炮、黄表、酒浆、小菜之费。”祭祀结束后,这些人则“分其余,又以猪半箇交下会之人,折钱若干,以买小猪,为次年之祭,周而复始。”^②这样既可达到虔诚拜谒诸葛亮的目的,又可节省费用,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,适合当时小农经济的社会现实。

三、清代勉县武侯墓的清明庙会

在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祀之中,民间演戏是有其历史习俗与传统之一。在勉县武侯祠、墓,今天仍还保存着两座清代风格的乐楼。所谓乐楼,即戏楼,就是昔日演戏的场所,它们不仅是武侯祠、墓的重要古建筑和景点,而且不容置疑地显示过去庙会的历史。这里即对勉县武侯墓清明庙会作初步探讨。

武侯墓清明庙会起始何时,目前尚难确定。有的学者认为,景耀六年蜀汉朝廷“立庙于沔阳”,“这样就形成了今天武侯墓清明庙会的由来”。^③这种说法大致无错,因为清明庙会与武侯墓的祭祀相连,再说目前尚无确切的文献抑或实物证据去证实。不过就笔者所知,武侯墓清明庙会在宋代已有记载,著名文学家陆游说:“兴元府西县,每岁清明,男女皆上诸葛公墓。”^④这固然与清明扫墓之习有关,但更重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位千古名相的纪念,由此其清明庙会想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。

见诸记载,武侯墓清明庙会已成规模并业已定制,则出现在有清一代。武侯墓清明庙会,至晚在嘉庆年间,即呈现一片人流涌动的景象。“是日百货俱集,南郑、城固、褒城之人赛神者甚众。”^⑤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。光绪年间,“公举会董,以均劳逸也。查墓会一切事宜,向由三牌公举会董协同办,后每年清明前半月,仍由三牌选举公正廉洁符于乡评者,一牌各二人,先期禀报列案,由县核准定额五人,至清明办讫会商之日,即交新董接充,不得瞻徇恩留,致违定例。”^⑥这种定例由来已久,且管理方法较为完备,因此,清代勉

县武侯墓清明庙会,是十分兴盛的。

进入20世纪后,这种清明庙会仍不断发展。如1942年4月5日,时任勉县中学教员的著名学者郑异之先生,曾率学生参加武侯墓的民族扫墓节,对其作了全方位的记述:

率诸生往武侯墓,参加民族扫墓节。勉人为侯来扫墓者甚众,其俗不知始于何时,至今不衰,会之兴实缘于此。会期三日,今首日也。会甚热闹,茶酒饼饵,日用杂物,帝及笔墨砚瓦,小儿玩具,悉有售者。烟尘飞腾,人马喧聒,状若故园之泰山会,就墓门外情形视之,沟壑起伏,松柏郁茂,有似泰山会上之张家大林,于是油然而起故乡之思。至参加祭扫者,到各机关学校一两千,惟仪式单简,敷衍故事而已。^⑧

举行清明庙会是现在武侯墓的“专利”,但武侯祠亦有类似的活动。据现存石刻记载,“每年清明、七月二十三日,酬神演戏。凡绅士及读书之人,均要衣冠整齐,早临拈香,即日饮福,违者有罚。”^⑨由这个严格规定看出当时对其的重视程度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,武侯祠的祭祀当为春秋二祭,春祭似无活动,而秋祭却有“酬神演戏”的活动。

顺便再提一下武侯祠、墓的乐楼。武侯祠的乐楼,系歇山式重檐建筑,前后檐,八角起翘,檐柱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。其修建时间,有学者认为重修于嘉庆十四年(1809年),^⑩不知何据。但据虚白道人所编绘的武侯祠图看出,嘉庆时期确已有乐楼,只是未记何年所建。因此至晚在嘉庆年间,乐楼已建成,且位居古金牛道之北、牌楼的对面。近年来,古建筑学者以及文物专家,根据其建筑风格等,确定其当建于明代末期。果若如此,乐楼则是勉县武侯祠现存最早的建筑。当然,据现存武侯祠的石刻,光绪六年夏,勉县鸠工重修武侯祠。达官显贵“各捐巨资”,汉中诸县“就地劝办”,次年竣工。这次维修,除重加彩绘外,还新建钟、鼓楼和“前戏楼一座”。^⑪

这里所谓武侯祠戏楼新建于光绪七年(1881年),当是维修,而非始建。而武侯墓的戏楼,其风格与武侯祠的乐楼相类,其始建时间一直悬而未释。据现存碑石记载,同治太平西征军影响汉中后,武侯墓南北大院及重要建筑毁坏殆尽,“仅存五间大殿,墓前卷棚一所”。同治七、八年间,武侯坪各牌首事人等,“力任其劳,远迩募化”,修建了拜殿三间,戟门三间,廊房九间,此外还有“戏台一座”^⑫。此戏台即乐楼。由此看来,武侯墓的戏楼修建于同治七八年(1868~1869年)间。但据其建筑风格,武侯墓戏楼当修建于嘉庆年间。

清明节,俗称鬼节,是祭祀先人的节日。唐开元十二年,“寒食上墓,礼经无文,近代相沿,寝以成欲,士庶之家,宜许上墓,编入五礼,永为常式。”扫墓祭祖被列入五礼之中。晚至北宋时期,这种祭祖之风增加了娱乐之风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,“清明日,都市人出郊,四野如市,往往就芳树园囿之间,杯盘酬劝,抵暮而归。”将其演化为综合性质的节日。不过这种节日,南人与北人不同,《五杂俎·天部》记载,“北人重祭而南人重戏游”。汉中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,不光自然地理因素是如此,其历史文化亦是如此。就全国武侯祠的祭祀来说,勉县武侯祠、墓的祭祀,有隆重而肃穆的祭祀之礼,也有热闹而各显其能的清明庙会。

由历史上形成并发展的清明庙会,迄今仍是勉县乃至汉中的年复一年的重要节日。每年清明节前后,定军山下武侯墓文管所,在勉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,均年复一年举办清明庙会,且已形成定制。只见庙会期间,附近群众接踵而至,人潮涌动,商贩们叫卖声此起彼伏,各地方剧团纷纷闪亮登场演出,继续着这种庙会的传统,使之集旅游、商贸、娱乐为一体的活动。近年来,武侯祠文管所亦在春节期间成功地举办庙会,并呈现出一定的规

(下转第56页)

- 王仁波、何修龄、单韦：《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》，《文博》，1984第1、2期。
- ③《中国历代服饰》，学林出版社，1984年4月。
- ④⑤⑩⑪⑫周峰著：《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·隋唐五代部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87年版。
- ⑧⑥北宋沈括：《梦溪笔谈》
- ⑦孙机：《唐代的马具与马饰注释第(5)》，载《文物》，1984年第4期。
- ⑨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
- ⑬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》，中科院考古所编，文物出版社。
- ⑭见《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反映的地上宫室》，载《文物与考古论文集》，1986年。
- ⑮张鸿修编：《唐墓壁画集锦》，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1年版。
- ⑯陕西省博物馆、礼泉县文教局：《唐郑仁秦墓发掘简报》，载《文物》，1972年第7期。

(上接第44页)

模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勉县武侯墓、祠千百年承续下来的这种民间文化活动，一定会与时俱进的。

注 释

- ①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，裴松之注引：《襄阳记》语。
- ②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。
- ③贞元十一年，《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并序》，现存勉县武侯祠文管所。见陈显远编著：《汉中碑石》，第110页，《陕西金石文献汇集》之一，三秦出版社1996年4月版。
- ④《孙可之文集》卷八《杂著·刻武侯碑铭》，《宋蜀刻本唐人集从刊》之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11月版。
- ⑤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卷三《祀典》。
- ⑥成化二十一年，《重修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记》，现存武侯祠文管所。见《汉中碑石》，第150页。
- ⑦嘉庆七年，马允刚：《重修忠武侯墓祠记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第233页。又，郑异之：《萍踪漫记》，1941年8月31日日记。
- ⑧嘉庆二十二年，严如煜：《重修诸葛武侯祠正殿碑记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247至2448页。
- ⑨咸丰二年，《重修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祠戟门记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284页。
- ⑩咸丰二年，《重修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祠戟门记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284页。
- ⑪民国四年，《武侯墓定章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93页至395页。
- ⑫徐国平：《论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》，载《羲皇故里论孔明》，第50页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1997年9月版。
- ⑬参考徐国平：《论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》，载《羲皇故里论

- 孔明》，第49-50页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1997年9月版；又，徐国平：《论诸葛亮后裔的敬宗意识》，载《诸葛亮与三国文化(一)》，第407页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7月版。
- ⑭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卷三《祀典》。
- ⑮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，卷首《凡例》。
- ⑯黎庶昌：《祭武侯墓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43页。
- ⑰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卷三《祀典》。
- ⑱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卷三《祀典》。
- ⑲李化龙：《祭汉诸葛武侯墓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183页。
- ⑳李化龙：《祭汉诸葛武侯墓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184页。
- ㉑彭龄：《祭武侯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237页。
- ㉒黎庶昌：《祭武侯墓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43页。
- ㉓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卷三《祀典》。
- ㉔何红英：《定军山下武侯墓》，载李兆成等编著：《武侯祠史话》，第129页，《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》之一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5月版。
- ㉕陆游：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七。
- ㉖虚白道人：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卷三《祀典》
- ㉗民国四年《武侯墓定章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93至395年。
- ㉘郑异之：《萍踪漫记》第95页，江苏南京1998年内部版。
- ㉙光绪三年，夏鼎：《重修武侯墓庙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27页。
- ㉚杨代欣：《勉县武侯祠》，载李兆成等编著：《武侯祠史话》，第135页。
- ㉛光绪七年，胡丙煊：《重修武侯祠记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33页。
- ㉜光绪八年，《改修武侯墓庙南北廊房碑》，《汉中碑石》，第338页。